



沈从文的小说《劫余残稿·雪晴》中有一段文字,描写一个让人香甜入梦的居室:“我躺在一铺楠木雕花大板床上,包裹在带有干草和干果香味的新被絮里。细白麻布帐子如一座有顶盖的方城,在这座方城中,我已甜甜地睡足了十个钟头。”

这干草和干果的香味,会是什么样的呢?我闻过夏天割下来的草晒干后的气味,的确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清香;我的床头,有学生送的据说可以助眠的薰衣草香包。陪伴我很多年了,香包依然有淡淡的香,不一定能让我安眠,却能让我安心。干果又会是哪一种呢?我猜不出来。如果把桂圆干、山楂干放在床头,那种比鲜果还浓郁的果香,勾起的恐怕不是睡意,而是馋虫了。想象我睡在小说中这样一座方城里,醒来时,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颗水果糖吧。

沈从文还将这座方城,放置在一个舒适暖和的房间里,在画面、气味之外,又增加了特殊的音效:“房正中那个白铜火盆,昨夜用热灰掩上的炭火,不知什么时候已被人拨开,加上了些新栗炭,从炭盆中小火星的快乐爆炸继续中,我渐次由迷蒙渡到完全清醒。”小说中似有一个摄像机镜头,从特写调到近景再调到远景——从帐子到屋子,再到“屋外的溪涧、寒林和远山,为积雪掩覆初阳照耀那份调和,那份美”,带我们进入山水画悠远而古老的意境。带学生鉴赏古诗时,“以动写静”“以动衬静”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这类诗句,因被引用得太多,对学生来说已无新鲜感和冲击力。如果换成现代小说,或许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共鸣。还可以置换成他们更熟悉的场景:安静的晚自习教室里,翻动书页的窸窣之声;空调的嗡嗡之声;一个同学打起了瞌睡,头突然撞到桌上,砰的一声……

小说以这样的“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”引出的,却并非田园牧歌式的故事,而是私奔、剿匪、火拼……难道东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暖帐寒潭

周春梅

方山水画秒变西部警匪片?

当然没有。沈从文描写的,依然是古老的乡土中国、稳定的礼治社会。只是正如同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所指出的,礼只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。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、像《镜花缘》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。礼并不带有“文明”,或是“慈善”,或是“见了人点个头”、不穷凶极恶的意思。礼也可以杀人,可以很“野蛮”,鲁迅以《狂人日记》点出礼教“吃人”的本质,振聋发聩。在大众的印象中,沈从文的作品温和美丽,与鲁迅的冷峻犀利迥然不同。也有学者指出,“沈从文写下的是民风的淳朴,乡间伦理的通融,他躲避了启蒙主义立场而遵从的是乡下人的逻辑”。但在《劫余残稿·巧秀与冬生》中,巧秀母亲沉潭的故事,却与鲁迅小说殊途同归,为“吃人”作了生动的注解:“一些年轻族人,即在祠堂外把那小寡妇上下衣服剥个精光,两手缚定,背上负了面小石磨,并用藤葛紧紧把石磨扣在颈脖上。大家围住小寡妇,一面无耻放肆地欣赏那个光鲜鲜的年轻肉体,一面还狠狠

地骂女人无耻。”沈从文未曾使用启蒙主义的话语系统,只是轻轻带了一句:“在纷乱下族人道德感和虐待狂已混淆不可分。”

小说结尾这样写小寡妇沉潭之后:“水天平静,什么都完事了。一切东西都不怎么坚牢,只有一样东西能真实的永远存在,即从那个对生命充满了热爱,却被社会带走了爱的二十三岁小寡妇一双明亮、温柔、饶恕了一切的眼睛中看出去,所看到的那一片温柔沉静的黄昏暮色,以及在暮色倏忽中,两个船桨搅碎水中的云影星光。”我又想起鲁迅《在酒楼上》中阿顺的那双眼睛:“独有眼睛非常大,睫毛也很长,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,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。”这双曾让小说中的“我”“祝赞她一生幸福,愿世界为她变好”的眼睛,后来常常落泪,不久后竟永远地闭上了,缘由仍是不能自主的婚姻。

这两双眼睛,一在天上,一在水中,闪耀着明月般的清辉,将古老中国富有诗意的“溪涧、寒林和远山”笼罩在清寒中。这寒意,驱散了《劫余残稿·雪晴》中房间炭火的暖,也驱散了当下教室里空调的暖,提醒我们:任何对“乡土中国”的怀旧或审美,都必须包含对其中血泪的清醒认知;任何“现世安稳”的体验,都不应隔绝绝对历史寒意的感知。

不要忘记这两双眼睛,还有那千万双在历史长河中逐渐黯淡的女子的眼睛。

朋友年纪不大就获得了高级职称,高兴之余,他请了包括我在内的7位好友相聚。席间,面对朋友的成就,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:有人直言:“高级职称当然好,但对我来说太难了,我不想评了,只想过好当下,把每一天都过得开心一些。”还有人说:“我至多能评上副高,如果能评上就

看法与活法

徐悟理

十分满足了。”另有一人则表示:“我更喜欢看书、运动以及和有趣的人交往,对职称不感兴趣。”

听了这些,我觉得朋友的朋友圈非常健康,不是清一色追求高职称的人,而是各有各的看法和活法。确实,一个人对职业、生活有什么样的看法,就会有什么样的活法。

马谡与诸葛亮情同父子。用马谡守街亭,绝对是感情起了作用。此时,诸葛亮身边,蜀中名将赵云、魏延、姜维都在,并非无人可用。况且,可选将领无论实战经验,还是作战谋略,都远在马谡之上。

锤子·剪刀·布

王俊良

用“锤子、剪刀、布”游戏决胜负,是国人的规则启蒙。依锤子砸剪刀,剪刀剪布,布包锤子规则决胜负,一环扣一环的规则虽简单,却蕴含着识人用人哲理。

锤子的威力,是之于钉子的;剪刀的价值,是之于布的。此番道理,将“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”,贯穿于人的管理层面。

贞观之初,李世民要求大家荐贤。重臣封德彝久无所举,还强词夺理,说“非不尽心,但于今未有奇才耳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载,李世民批评封德彝,“君子用人如器,各取所长,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哉!正患己不能知,安可诬一世之人”?一言以蔽之,“锤子、剪刀、布”,各有各的性情,各有各的用途。原则是“生才贵适用,慎勿多苛求”。清人顾嗣协,诗解用人如器云,“骏马能历险,犁田不如牛;坚车能载重,渡河不如舟”。

舍长以就短,智高难为谋。以剪刀楔钉子,显然用非所长;用锤子剪布料,更是张冠李戴。看似荒诞的用人背后,或因荐者智短,或因举者私心。

诸葛亮用马谡,明显是用剪刀楔钉子。马谡其人,白帝城先主托孤,特意叮嘱诸葛亮,此人言过其实,不可重用。素以知人善任闻名的诸葛亮,真没看出马谡到底是锤子,还是剪刀吗?非也。

用马谡守街亭,绝对是感情起了作用。此时,诸葛亮身边,蜀中名将赵云、魏延、姜维都在,并非无人可用。况且,可选将领无论实战经验,还是作战谋略,都远在马谡之上。

用马谡、王平与司马懿、张郃街亭对决,无异于以卵击石。用现在的话说,根本没在一个段位上。原因在于,诸葛亮太想给马谡一次机会,马谡也太需要有一次机会,来证明自己。

然而,布的华丽转身在于剪刀,就算把锤子舞得呼呼风响,也断无华服现身可能。马谡失街亭,直接影响到蜀魏两国走势。此番情景,恰与官渡之战中袁绍弃用许攸,使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态势,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样。

一用一弃,都以惨败告终。是人的问题吗?不是。还是这个许攸,到了曹操那里,立即改变了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的被动局面。人还是那个人,水平还是那个水平,只是用人者发生了易位。

同一个人与不同的人合作,能力和业绩竟判若两人,原因何在?无非就是用人识人问题。在袁绍眼里,许攸是个锤子;在曹操看来,却是一把裁天剪地的剪刀。用人的前提是识人。

李世民说,用人如巧匠之制木,直者以为辕,曲者以为轮,长者以为栋梁,短者以为拱角。然则,明知“锤子、剪刀、布”之理,仍以锤剪布,用剪楔钉,若非武大开店,即为司马衷坐堂,论理若是,智短也哉?

●网络新词语

反向春运

吴明静

“反向春运”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过年团聚新模式,指春节前后,老家的父母前往子女工作的城市共同过年,节后再返回家乡。

以往都是子女返乡看望父母,如今是父母带着家乡的年货进城,在子女工作生活的城市体验不一样的年味。这种模式兴起的主要原因是,春运期间从大城市出发回老家车票一票难求,而反向车票则相对充足且价格优惠。对于子女而言,“反向春运”省去了抢票奔波之苦。同时,随着父母一辈观念的转变,越来越多身体健康的父母愿意出门远行,借着春节假期体验子女在大城市的生活。

“反向春运”的出现,缓解了传统春运的运输压力,也打破了“过年必须回老家”的固有模式,让团圆的方式更加灵活多元,成为现代家庭流动过春节的新选择。



丁字沽一带的磨房有两种形式,一种主要为自家店铺加工粮食,另一种是专门为用户加工粮食,后者规模较大,不仅有拉磨的,还有推磨的、手磨的和小型仓储。“曹家丝糕”在丁字沽非常有名,他家不但有磨房,而且已经使用驴来拉磨,这在当时就算“半自动化”了。“曹家丝糕”的主要原料是大米,而且

●图说历史

磨房

长弓文并绘

必须用河南的籼米、山西的碱面。二斤半的米、一斤半的枣儿,蒸熟了,七斤半一个。“曹家丝糕”之所以受欢迎,就因为面磨得好,中间要过好几遍箩。蒸熟的丝糕除了在铺子卖一部分,其余的就挑着挑儿到宜兴埠或辛庄、堤头、西沽售卖。此图根据丁字沽居民杨世均、曹振刚的口述绘制而成。

